

湖南文史通讯

- 扩大文史资料影响 做好两刊发行工作
- 组稿四得
- 我所知道的平江不肖生
- 何键指挥的湘赣“会剿”
- 1987年湖南全省文史工作大事记(上)

87.3

87.3

资料室

87.3

1987

4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HUNANWENSHITONGXUN

4

电话：二六五七六
地址：长沙市迎宾路十五号
发行：湖南省政协文史书刊发行组
出版：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责任编辑：朴永子
编辑：《湖南文史通讯》编辑组

1

湖南文史通讯

4

1987
(总第20期)

编 责 出 发 地 电
任 任 任 任 任
辑 辑 辑 辑 辑
： 《湖南文史通讯》编辑部
： 长沙市迎宾路十五号
：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 史 论 坛	让文史书刊迎来更多读者……………彭 俊 (2) 我们的事业需要文史书评……………陈永芳 (3)
文史工 作漫谈	省政协部分委员谈文史工作…………… (4) 谈文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目与利用工作……张叔复 (5)
发 行 园 地	努力克服困难 积极做好发行工作……………张朝玉 (6) 搞好文史书刊发行工作 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 ……………谢典球 (7) 抓好发行工作 扩大社会效益……………杨敬德 (8) 加强组织 依靠群众 搞好发行……………吴云城 杨云卿 (9) 努力做好文史书刊发行工作……………方炎相 (28) 明年征订工作取得初步成绩……………发行组 (封底)
经 验 参 考	处理好市与区的协作关系……………谢道锡 (10) 搜集整理龙云飞史料的体会……………邱晓玲 (11)
工 作 动 态	扩大文史资料影响 做好两刊发行工作 ——各地、州、市征订1988年文史书刊概况…… (29) 大庸市文史资料工作出现新局面……………吴云城 (13)
征集工 作漫谈	组稿四得……………高 原 (14) 株洲逐步向海外开展征集工作……………罗章生 (12)
文 史 书 评	一幅色彩斑斓的抗战烽火图 ——读《湖南文史资料》26辑有感……………苑 芸 (16)
本 刊 专 访	风雨浸润十余秋 ——访陶菊隐老人……………岳 枫 (18)
历史事 件与历 史人物	我所知道的平江不肖生……………黄曾甫 (20) 何键指挥的湘赣“会剿”……………叶星云 (22)
文 史 短 波	省政协文史委召开第五次会议…………… (26) 省市政协邀请桂滇川等省文史工作者座谈…………… (27)
来 函 照 登	来自老山前线的书信…………… (17)
文史研 讨园地	对《民国人物传·唐生智》的订正补充 ——兼与作者商榷(一)……………李吉荪 (24)
	1987年湖南全省文史工作大事记(上)…………… (23)
出 版 信 息	《问道语溪水亦香》一书出版……………苏联民 (27)
图 片	省政协文史委召开第五次会议…………… (封二) 《湖南文史资料》在首都展出…………… (封三)

让文史书刊迎来更多读者

彭俊

搞文史工作的同志都知道,编辑文史书刊的目的,是为历史研究和教学服务,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要达到这些目的,显然,没有一支庞大的读者队伍是不行的。这是因为,读者越多,文史书刊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因此,提高文史书刊质量和扩大读者范围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

提高书刊质量与扩大读者范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般来说,读者的多少与书刊质量的高低是成正比的。那么,怎样才能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呢?我想就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要重视文史资料的可读性。目前,文史书刊的发行量不大,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史资料的可读性重视不够。有些同志认为,文史资料主要是供历史研究者和中老年人士看的,只要资料性强,其他方面弱一点也无关大局。但失去了可读性,就会失去更多的读者,那么再宝贵的资料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中年以上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而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就更为有限,因此,文史资料还应面向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读者,使他们学到历史知识、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在校学生或社会青年,他们的阅读时间总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时间内,必然会选择那些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较强的读物。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史资料不能是刻板枯燥的八股文,而要把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与史料性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

二、编辑文史资料书刊要注意比例协

调。所谓比例协调,在这里指的是各地区(或地方)的文史资料在书刊上登载的比例关系。一般地,省级文史书刊,既要立足本省,又要面向全国,同时还要注意省内各地区之间的资料在大体上的比例协调。由于文史资料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一般读者更喜欢看自己所在地区(地方)或与之有关的史料。如果在一本文史书刊上,看不到一点自己所熟识的史料,读者便很少有买书的兴趣。地级或县级文史书刊也是一样,尽可能考虑到各方面的读者。当然,作为书刊的编者,也有自己的难处,在编辑过程中,若欠缺某一地区(地方)的史料,一般不可能亲自去采访和整理。这就要求在编书之前,要按书的内容有目的的约稿。

三、提高撰稿质量,抓好发行工作。目前文史资料来稿的质量,就笔者知道的情况而言,质量高的较少,一般化的较多。这类稿子从文字的表达到文章结构与内容的详略取舍,都要作较多的加工,编辑任务比较繁重。要使这个问题逐步得到改善,主要靠文史撰稿员在写稿过程中摸索经验,多看办得好的文史书刊,从中借鉴有益的写作方法。

发行工作是出版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发行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读者的多少以及书刊产生社会效益的大小。目前,政协系统所编辑的文史书刊,大都采取自办发行的方式。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湘西自治州政协文史书刊的发行经验(载《湖南文史通讯》1987年第3期)值得借鉴。当然,其他地区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相互交流。但总的说来,当前文史书刊的发行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们的事业需要文史书评

陈永芳

小说有人评论，诗歌有人评论，专著有人评论，并经常可以看到振聋发聩之作，让人受到启迪。而文史书籍呢？则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书评屈指可数，好的书评更是凤毛麟角，这与蓬勃发展的文史工作极不相称。因此，广大文史爱好者希望有好的文史书评。

文史工作者在编书过程中，呕心沥血，可谓“十月怀胎”，“分娩”后，社会效果怎样？读者的反映如何？这是编者急需知道的。据说相声演员最怕听众的沉默，那么编者呢？恐怕最

怕读者毫无反响了。中肯的文史书评对编者改进工作，提高编辑质量，是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的，因此编者是欢迎书评的。

文史书评对作者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它使作者看到“三亲”史料在“三个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激发他们的历史责任感，从而把自己掌握的史料全部奉献出来，以丰富祖国的史料宝库。另一方面，又为作者撰写文史资料提供了借鉴：文史稿件写什么？如何写？他们便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出版的文史书籍是给人看的，书评的目的就在于指导人们去正确地了解书籍。“三分书，七分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文史书评如何评？评什么？

首先，必须抓住文史资料的特点来评。文史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为主，二是时限（1898—1966年），三是中共党史以外的史料（但包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这三点，我们经常宣传，按照上述要求编写出来的书籍，就应该给予肯定。反之，就应给予善意的批评。

其次，从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来评。如新出版的文史书籍，有多少史实是鲜为人知的？它对研究和了解某一历史人物与事件有什么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的政治关、史料关是否把握好了。另外，文史书籍往往是几组甚至多组史料的汇集，书评难度大，因而在评论中，就得牢牢把握住编者的编辑构思，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第三，可以对编辑技巧和书籍的装帧设计等加以评论。如编辑栏目是否新颖别致，文章编排是否独具匠心，文章修改是否精雕细琢，封面设计是否不落俗套，印刷装订是否精美无缺等等。

此外，文史书评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该肯定的就肯定，该批评的就批评，要防止走极端。而现在的书评，大多数都象一首赞美诗，对书中的缺点错误视而不见，有的虽然提到了不足之处，往往是轻描淡写，认为是“白璧微瑕”。

我们有的编者也听得赞美之辞，倘若有人指出书中的不足，则以为人家是吹毛求疵，这不利于文史工作的健康发展。

不论是编者，还是作者、读者，都在呼唤高质量文史书评的出现，我们希望文史爱好者拿起笔来，写出你们的真实感受！



省政协部分委员谈文史工作

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引起高度重视

刘国安副主席说：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特作用。它既可以为历史研究、地方志编纂和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资料；又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历史知识教育提供生动的教材；它所记述的中国工商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经验，不少可直接为四化建设提供借鉴；它对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和支持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李肇副秘书长说：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组成部分的文史资料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促进爱国统一战线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发表一篇好的文史资料，往往能起到团结教育一大片的社会效果。因此，文史资料工作的好坏，不仅影响国内，而且影响国外，不仅影响今天，而且影响将来。各级领导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文史工作的领导。

黄曾甫委员（省民建、工商联文史委员会主任）说：目前文史办在政协机关地位不高，工作中的困难较大。我认为首先是政协领导不重视这项工作，认为文史资料工作没有直接的社会效益，可有可无，实际上它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文史资料是一种“软件”，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次省里开第三次文史工作会议，有些县派的不是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来参加，这种应付差事的态度是很不应该的。

文史机构的编制和经费都应增加

· 这是部分政协委员在今年省政协五届五次会上的发言摘要。

宋斐夫委员（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说：政协文史机构是一个办实事的部门，事业性很强，人太少就干不成事业，不能把它当作行政单位看待。一年来政协做了许多工作，我看其中文史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文史部门与党史部门、地方志部门一样，分工承担着特定范围的史料征集和编研任务，因此，文史机构的编制、经费和机构设置应与党史、地方志部门大致相同。

黄曾甫委员说：文史办与党史、地方志部门相比，无论是在人员编制，还是在经费上都悬殊甚大，因此很多工作无法开展，真有“人亡史失”的危险。希望省委、省政府给予重视，将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改为事业实体，增加编制和经费。

要把“抢救”工作落到实处

钱去非委员（省民革顾问）说：征集工作在整个文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是大家公认的，都主张将征集、“抢救”工作放在首位。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却没有做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丰富阅历的人士健在者大多年事已高，不少人健康欠佳，如不及时“抢救”这些活资料，就可能“人去史亡”，给文史工作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对“抢救”工作一定要有紧迫感，把它落到实处。

刘晴波委员（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说：对征集“抢救”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即使目前人手紧张，也要想办法、下决心组织力量，采取有效措施，走出去，真正把“抢救”工作当作首要任务来抓，而且要真正抓紧抓好。

（下转7面）

谈文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目与利用工作

张叔复

系统地浏览了我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编的《湖南文史资料》和《湖南文史通讯》后，深深感受到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很重要，它是为研究近现代历史、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的，也和湖南省地方党史的征集与研究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因为研究地方党史也少不了文史资料，两者是互为作用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必须认真抓好。

一、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是文史资料研究的基础。重点应摆在“三亲”史料上，因为亲身经历近、现代史上重大事件的人，现已年届耄耋，如果不抓紧“抢救”，就会面临“人亡史失”的危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切实抓紧抓好，这是其一；其二是个人保存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书信、日记、手稿等，也应列入征集范围。

二、文史资料的整理编目工作，就是将征集来的文史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使其系统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编目造册。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摸清了家底，做到心中有数；二是便于总结经验，摸索征集

史料的规律，促进征集工作向纵深发展；三是便于保管和提供利用；四是建立全省文史资料目录中心创造条件。

三、文史资料的利用工作。征集文史资料的目的，全在于利用。文史资料的利用是多方面的，如为编写地方党史；为编写地方志、人物传记；为编写重大历史事件、专题史稿；为印证史实；为经济建设；为两个文明建设，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都起着重要作用。搞好文史资料的利用工作，必须认真抓好两条：一条是积极提供利用，将征集到的史料编成目录，提供利用者使用，方便利用者查阅史料；同时，通过利用，可以检验史料的价值。一条是有计划、有重点地编辑出版史料，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扩大文史资料的影响和提高文史资料工作的社会地位。

总之，我认为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要把这项工作抓好，还必须加强与党史、地方志、教学、研究部门和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的密切联系，互通信息，逐步建立信息网络，促进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作者系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上接6面）

本，接着人大在家的大多数同志都各订购一本。县检察院、邮电局、电影公司的领导也积极发动本单位的职工订购此书。同时，在街上见到熟人，我就向他们宣传，有一位退休在家的干部，闻讯后特地从8华里以外的石鸟溪村赶来县城找我订购，就这样，仅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台湾闻见录》150余本的发行。此外，我下乡采访搜集资料，也经常随

身带一些《湖南文史资料》，一边宣传、一边销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还利用县政协召开会议的时机，将《湖南文史资料》带到会场向政协委员们宣传和销售。政协常委陈琦不但自己带头购买，还向其他委员宣传说：《湖南文史资料》的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值得一读。在他的带动下，有许多政协委员都选购了自己喜爱的《湖南文史资料》。

努力克服困难 积极做好发行工作

新晃侗族自治县政协 张朝玉

我是1986年7月，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到县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的。刚来不久，原来分管文史资料发行工作的同志去县党校学习，为了不使这项工作停顿下来，县政协领导决定由我来负责发行工作，我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我深知发行工作，是一项牵涉面广、难度较大、时间性很强的工作，于是，我充分利用自己过去与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界人士联系较多的关系，广泛地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各界读者订阅《湖南文史资料》和其他刊物。从去年9月以来，在做好史料征集工作的同时，共发行《湖南文史资料》、《湖南文史通讯》、《台湾闻见录》等近700余本，为史料的发行尽了一份力量。我的体会是：

一、端正态度、提高认识。

首先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还要有不厌其烦、热情为读者服务的态度，这样才能打开发行工作的局面。

刚接管发行工作时，由于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去，人们不了解文史资料的性质和内容，销路不畅，使我产生了畏难情绪，曾几度向文史委员会的领导提出，请他们致信省政协文史办不要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下面，以便我们集中更多的精力去从事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经过学习有关文件和领导的耐心帮助，使我认识到，发行工作是文史资料发挥社会效益的纽带，是搞好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一环。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思想，就坚定了

做好发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二、克服困难、积极深入。

新晃侗族自治县，位于湘西边陲，城区自然分为三镇，相隔约六、七华里，发行各类文史资料及报刊在没有固定经营门市部的情况下，困难确实不少。开始搞发行工作时，有许多同志问我，你销售书报，是否调到新华书店工作。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并借此机会向他们宣传文史资料的内容，动员他们购买文史资料。

在发行中，我的工作重点是离退休的老同志，我经常送书上门，争取他们订阅，并请他们利用老人聚谈的有利时机代为宣传。很多离退休老人表示，县政协如此关心我们老年人的学习，我们要为四化建设发挥余热，多作贡献。现在有些人一见到我就问：是否又来了什么新书，如果有，请莫忘记给我留一本。

今年6月下旬，我收到省政协文史办寄来的《台湾闻见录》一书的征订单后，有些犹豫，因为当时正忙于征集史料工作，终日东奔西跑，没时间顾及发行工作。但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要我把史料的征集工作与《台湾闻见录》一书的征订工作结合起来抓，以征订为主。领导的支持，更增加了我搞好发行工作的信心。我深入到县属各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宣传发动，得到他们大力支持，如县人大主任杨顺沛看了《台湾闻见录》的征订说明后说：此书很好，我订一

(下转5面)

搞好文史书刊发行工作 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

沅江县政协 谢典球

我在沅江县政协工作多年了。1986年5月，在我古稀之年，担任了省政协文史办特约发行员，使我有机会为文史书刊发行工作，尽一点微薄之力。

可是，接受任务不久，就遇到了难题。原因是1986年6月，省政协文史办寄来了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订购单40份，145.6元一份，有些人看了内容介绍后，对此书很感兴趣，但一看书的价格就面露难色。怎么办？我想只有发挥我多年作统战工作的优势，利用对统战对象熟悉这一条件，采取分块联系的办法，由几个人合订一份，然后再向机关、单位、学校集体推购。由于，我到哪里就依靠哪里的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加之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快就完成了发行任务，全部造册上报，销售金额为5800多元。接着完成了省政协文史办委托我的自1986年7月至今的全部发行、征订《湖南文史资料》和《湖南文史通讯》的任

务。发行湖南文史书刊120本，落实文史书刊征订单161份。

为了搞好发行工作，把文史资料按期送到读者手中，我坚持勤跑腿、广交友、常联系、多宣传、重调查。我不会骑自行车，除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段乘坐车船外，一般乡村偏僻的地方都是步行，有时一天来回走数十里，甚至外出十天半月，风雨无阻。有人问我：“谢爹，您老70多岁了，为什么不休息一下，何必这样自讨苦吃。”我的回答是：

“为了振兴中华、振兴湖南、振兴沅江，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搞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何苦之有，你看我不是越活越年轻，越干越为劲吗！”

我对今后发行工作的打算是：提高服务质量，拓宽发行渠道，邮递困难的送书上门，满足读者要求；利用调查、走访，随身携带书刊和征订单，以便及时做好发行工作，争取超额完成省政协文史办委托的发行任务。

(上接4页)

熊新民委员(常德市政协副主席)说：“抢救”文史工作，能够在政治上团结各阶层的人士，促进安定团结的局面，还能纠正某些历史资料中的谬误，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海外侨胞。

文史资料的价值在于真实

吴若虚委员(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说：征集文史资料要高质量。目前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质量比较高，我们在修志工作中就参阅和运用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受益匪浅。但还应进一步提高文史资料的质

量。对质量的要求，主要就是真实。个人的回忆，往往有些夸大或缩小。应该通过认真的核对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有些情况只有靠个人回忆，但有些事件有好几个人参加，就可以找当事人开座谈会，把一些有分歧的史实弄清楚，从而提高可信程度。

彭肇藩委员(湖南大学教授)说：文史资料，首先要求准确，特别是写人物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些人在写回忆录时，有意回避短处；这不是求实的态度。我们不要怕一些人有意见，只要实事求是就站得住脚。

(汤晓整理)

抓好发行工作 扩大社会效益

浏阳县政协 杨敬德

近年来，我们为了适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认真抓了《湖南文史资料》、《湖南文史通讯》的发行工作。由于领导重视、各方面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今年10月止，共发行《湖南文史资料》720本，《湖南文史通讯》130本，《长沙文史资料》410本，县级编写的文史资料1320本。由于发行工作的广泛开展，发挥了文史资料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扩大了社会效益。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做好发行工作的：

一、提高思想认识，做发行工作的有心人。我们克服了重征集出版，轻发行推销的思想后，认为发行推销也是文史工作者的份内之事。书籍是一种特殊商品，也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不让其流通，就不会产生社会效益。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教育了我们。比如1983年，为了纪念谭嗣同烈士殉难85周年，我们编写了一本《谭嗣同》，当时只作为应付会议用的，印数很少。谁知流入社会后，一时竟成了热门货，由于印数不多，满足不了需求，致使来人叹息说：“这样的好书，为什么不多印一点。”1986年，我们编写的《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书中详细记载了浏阳人民在这次起义中所作的贡献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此书很畅销，其社会反映良好。大量事实说明，人民群众是需要好的文史书籍的，文史资料以其自身的价值，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此，我们对发行工作有了新的认识，经常注意发行工作的动态，做文史资料发行工作的有心人。

二、扩大宣传，使发行信息传播四方。文史资料一般都不是开架图书，常有“躲在深闺人未识”之感。因此，发行工作好不好，就完全取决于宣传工作的效果了。我们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利用报刊反映。刊登广告支出太大，没有那么多经费。我们便采用通讯报导的方法，使新书信息在报刊上披露出来。比如《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一书出版消息，在《浏阳报》、《长沙晚报》和《湖南政协报》上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汇款，争相购买；二是在会议中穿插宣传介绍。县级机关经常召开许多会议，这是扩大宣传的好机会，我们常常利用会前会后“钻空子”，把书刊拿出来进行介绍，效果很好。比如去年县里开人民代表大会，两天中，我们在会上就发行了120本文史资料；三是书信往来，通报信息。县政协、统战部与县政协委员及各方面人士常有书信往来或寄发文件，我们就将要发行的书刊简要内容印成信件，随文件或书信寄出，委托他们向亲友推介；四是作为一项任务向委员布置。

三、投其所好，在发行工作中找到知音。文史资料的内容都是有所侧重的。读者大多根据本人的职业或身世、爱好进行选择。所以在发行时，我们投其所好，有的放矢，比如《湖南文史资料》22辑中，有陈明仁的自传，陈明仁的部下及其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士非常喜欢，他们就是主要的发行对象；《湖南文史资料》25辑主要内容是地方武装，我县有3000多原地方武装人员，他们闻讯后就买了400多本；《湖南文史资料》23辑就很受医师

(下转15面)

加强组织 依靠群众 搞好发行

吴云城 杨云卿

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湖南文史资料》是全省文史资料之精华，它的出版，为全省各地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提供了真实生动的地方教材。

近两年来，由于我们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文史资料发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86年至今年6月止，共计发行《湖南文史资料》600多本，《湖南文史通讯》160余份，《台湾闻见录》160本。通过文史资料的发行，有效地促进了政协工作和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我们在发行工作方面的主要作法是：

一、搞好宣传、提高认识。近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感到，搞好文史出版物的发行工作，不抓好宣传、提高人们的认识是不行的。我们除了在政协召开的有关会议和文史委员会召开大小会议上进行宣传发动外，还经常下到各区乡进行宣传发动。同时，仅就今年以来，我们向市广播电台投稿被采用的10篇稿件中，专门宣传文史工作的稿件就有7篇。尤其今年政协换届以后，在市内解放路办了宣传窗，已出了三期，其中两期都有《湖南文史资料》内容的简介。在各发行网

点都有省、州、市文史资料简介，所以，我市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史书籍的印象越来越深，喜爱文史资料的人越来越多，文史资料越来越受到各界的欢迎。

二、建立网点、落实人员。建立发行网点，落实发行人员，这是发行工作好坏、社会效益大小的关键所在。1986年以来，我们先后在全市的主要街道、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火车站、各区、乡、镇集市陆续建立了15个发行网点。同时，我们还根据热爱文史工作、热心为文史工作服务的条件选定了15名发行员。这15名发行员中，有文史业余撰稿员7名，个体经营者4名，在职和离退休职工4名，并制定了发行员应做到的有关规定。对于在发行中有突出成绩的发行员，同样纳入文史业余撰稿员一年一度的总结评比，给予表彰和奖励，这就调动了他们做好发行工作的积极性。

三、改进方法，送书上门。我们从发行工作的实际中体会到，等客上门与送书上门这两种不同服务方法，必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发行效果。一年多来，我们十分注意改进工作，热心送书上门，为读者服务。今年3、6月份我们在召开的征集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把发行工作作为重要议题加以研究，摆正了发行工作在文史工作中的位置，克服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促进了发行工作。如我市数字垭区发行员李祥俊、茅岗区发行员印启硕等，根据山区居住分散的特点，把发行工作与赶集结合起来，外出作客、参加婚丧集会与宣传送书上门结合起来，参加区、乡各种会议与发行工作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发行效果，李祥俊从1986年6月至今年3月，发行《湖南文史资料》21辑100余本，印启硕发行50余本。市内发行员吴献龙（个体户），仅用几天的时间就发行文史资料30余本。文史委员会的同志也送书上门200余本。

（下转23面）

搞好文史资料工作的各方面协作，各地经验很多，值得借鉴。如何搞好市与区之间的协作，理顺其关系，我们还处在探索之中。

我市辖九县三区（原辖二县四区），除加强市与九个县的协作关系外，工作重点放在市与三个区的协作上，处理好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发行三个方面的协作关系，推动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

要做到征集、编辑、发行三者的协调，必须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在两年前，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市政协召开过四区政协文史工作碰头会。通过学习省文史工作会议精神，基本明确了市与区政协文史工作的任务和目标，从而提高了对协作的重要性的必要性的认识。大家通过实践认识到，市与区之间要团结一致，通力合作，不要各自为政，孤军作战，甚至为出书而争抢文史资料。特别是区文史资料工作在人力、财力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更应处理好征集与出书的关系。由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处理好了两家在“征集、编辑、发行”工作中的协作关系，促进了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

在征集工作中，市与区相互配合，针对不同对象，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征集线索，或开座谈会，或登门走访，达到“广征博采、重点抢救”的目的。市与区都有各自的历史通讯员，组成了一支广泛的征集队伍。

市政协文史办同志应邀参加区政协召开的文史工作或文史通讯员会议，针对具体情况，进行业务性指导。市与区共同商讨征集任务，分工合作，既不分主次，也不推卸责任，以达共同完成征集任务的目的。

在编辑出版上，市与区有了明确的分工。三个区将征集到的文史资料核实整理后，打出油印稿，全部送交市政协文史办。我们根据每辑出版的重点优先发表区政协提供的史料。这样，编辑出版工作就出现一个以市为主、区里协助的协作局面。区文史委的同志积极性很高，没有因为未出书而影响征集工作。市辖县所提供的资料采取同样的办法。几年来，市辖三区未出书，征集工作同样开展的好，市西四征集工作尤为突出。

我们提出区文史工作的重点是征集和发行。三个区采纳意见后，积极主动，除搞好征集工作外，承担了市政协编辑出版的《邵阳文史资料》的发行工作。如东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谢楚华，一手抓征集，一手抓发行，通过努力，在东区新华书店设立了一个文史书刊发行点，发行工作很有起色。

市政协文史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是与区政协的配合协作分不开的。今后，在处理市与区的协作关系上，市应更主动帮助区开展征集工作，搞好发行工作，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使市、区文史工作更活跃地开展起来。

处理好市与区的协作关系

邵阳市政协文史办 谢道锡

编后语：本期刊登谢道锡《处理好市与区的协作关系》一文，意在引起广大文史工作者对如何搞好市辖区政协与市政协之间的协作，进行有益的探讨，以促进各省辖市文史工作的发展。欢迎来稿。

搜集整理龙云飞史料的体会

邱晓玲

今年9月,《湖南文史资料》第27辑刊登了我写的《龙云飞的一生》,我很高兴。这篇长达16000字的人物史料,是我利用暑假搜集整理的。从采访、调查、核对事实,到写成史稿,前后用了48天。通过对龙云飞史料的搜集整理,使我深深体会到,象我们这些没有亲历、亲见、亲闻经历的人,要想从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就只有靠“勤”字当头,即要勤跑、勤问、勤听、勤记、勤写。

凡到过湘黔边界苗区的人,都听说过有关“苗王”龙云飞的传说。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参观过山江(即总兵营)黄茅坪——土匪杀人便往里丢的“万人坑”和龙云飞钉人剥皮的“剥皮树”。再沿得胜坡往腊尔山乡走,沿途许多当年土匪关羊(抢劫)时留下的名字,如“鬼门关”“麻阳街”“望乡台”,令人毛骨悚然。“麻阳街”据说是龙云飞手下土匪专抢劫往苗区运盐的麻阳挑脚夫的地方;“望乡台”是土匪专砍过路外地客商脑壳的地方,因此,在我幼小的心里,就对龙云飞产生了一种憎恶感,认为他是个杀人如麻的“魔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编志修史机构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将许多历史(正反两方面的)人物编进了史志。凤凰县县志编纂办公室将龙云飞列入了人物志,并按照党的统战和民族政策,专就此人的定性、功过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龙云飞生于凤凰县木里乡打鬼岩寨,后迁总兵营蛤蟆洞寨(今山江镇叭固寨)。叭固寨是一个相当偏僻的苗寨,龙云飞就是在这里发迹的。50年间,他是怎样由一个普通苗民摇身

变为国民党军的师长、少将参谋,显赫于湘鄂川黔边境成为湘西“苗王”的呢?这些问题,象一个个谜,带着某种神秘色彩,吸引了许多人,各种各样的传说也比较多。但除了县志《人物志》里有一份关于他的个人小传外,再没有什么专门记载他的生平的史料了。

我从动了写龙云飞的念头后,就注意收集有关的资料,发现了两个难点:一是时间相隔太久,寻找熟悉龙云飞历史的人比较困难。龙云飞是1886年生的,与他同时代的人起码也八、九十岁了,即使在这山高水远的苗寨能找到这样年高的老人,也都不太会讲汉语。而龙云飞的后代(两个儿子、两个侄儿)又都在1951年1月的“万人大搜山”中毙命,孙子龙培生搜山被抓时才18岁,龙云飞死时,他还太年轻,有关祖父发家的情况掌握得不多。二是牵涉到民族政策问题,弄不好会冒些风险。要写这个人,不弄清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是不能贸然从事的,因此,许多要写龙云飞的人,一涉及到某些具体的问题就要下相当大的功夫四处奔走核对,时间一长这个念头就拖消了;三是有些部门和个人所掌握的原始资料,轻易不肯拿出,这就给史料的搜集增添了不少困难。

在分析了以上三个难点后,我不得不思考,“龙云飞的一生”还写不写?这次的搜集整理工作能否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我坚定了信心,写!相信只要自己“遍访知情,勤用功”,肯定会成功。于是,我跑遍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史志机构和档案部门,查阅了大量的资

料。在凤凰县公安局又查到了有关龙云飞的原始材料，即早两年专门组织人调查龙云飞的材料和有关龙云飞个人的卷宗有三大本，只是比较零乱，而且重复的、互相证明的材料较多。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如获至宝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查抄了几天，晚上、星期天，公安局的同志都为我开了门，准备了茶水。他们说我是“有心人”应大力支持，我也被他们这种热忱所感动，加倍地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如龙培生《关于祖父、父亲的一些情况》，儿媳吴桂芳及侄媳龙志英等口述的材料，对龙云飞的一生有了基本的了解。但是，为了解决龙云飞从哪年开始发迹等问题，我又来到了苗区。在懂苗语的镇干部的陪同下，我走访了一些知情人，如龙云飞的原部下龙岩丙、龙乔付、吴英、万廷昌、罗廷湘，龙云飞的外孙吴吉祥以及当地的老人。对一些细微的问题进行了反复核对。例如，关于“剥皮”一事的真象，社教时说，龙云飞剥了不愿为他“缝龙袍”的

裁缝田世洪的皮。这次经我反复查证，被杀的不是田世洪，而是大田一个苗民叫龙天胜，他是因与龙云飞弟媳吴妹崽通奸一事被钉在树上致死的。又如县志记载，龙云飞是从暂6师调第九战区任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谋的，而有些知情人却说龙是调第六战区任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谋，到底是“九战区”还是“六战区”？为这一字之差，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并找一些知情人核实，弄清楚了是第六战区。于是，我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与县志办的同志谈了，他们认为有道理，便把“九战区”改为“六战区”。后来又通过调查访问弄清了龙云飞的形象（矮矮墩墩，讲话轻言慢语）、性格（圆滑、温厚、吝嗇）等细节材料。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埋头整理写作，终于在开学前完成了《龙云飞一生》的搜集整理工作，尝到了勤奋耕耘的甜头。

株洲逐步向海外

开展征集工作

株洲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1980年以来，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同海外人士的联系，积极稳妥地开展向海外征集史料的工作。委员会采取直接通信或通过侨属联系等方法，先后向侨（旅）居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地的株洲籍华侨征集了《怀念我的父亲黄笃杰》、《张德粹自传——八十年生活过程之回忆》、《彭佐治生平事迹》等5篇史料，计4500余字。

解放前株洲教育界著名人士，原「新群学校」创始人黄笃杰先生，一生献身教育，殚精竭虑培育人才，在湘潭、株洲一带影响较大，但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为了征集黄笃杰先生的史料，委员会去年11月份与黄先生侨居加拿大的女儿黄守傅取得联系，请她撰写她父亲的史料，得到了黄女士的热情支持，很快就寄来了《忆先父黄公志存》一文，史料在《株洲文史》第10辑刊出后，黄守傅多次来信赞扬株洲市政协「做了一件好事」，「父亲九泉有知，定当含笑感恩。」今年11月份，黄守傅女士回长沙、湘潭探亲，又专程到株洲市政协表示感谢，并答应联系更多的海外株洲籍人士给《株洲文史》撰稿，为实现祖国统一出力。（罗章生）

大庸市文史资料工作出现新局面

1987年3月市政协换届以后,由于加强领导,全市文史资料工作成绩显著,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一、加强领导、上下一齐抓。

实践证明,加强领导是搞好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关键。1987年3月12日市政协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文史工作《要点》,并纳入全年政协五大工作之一,作了统一安排。3月13日第一次文史委员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吕光荣、常务副主席叶玉明、副主席任朝东、申康儒、兰光瑜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委员们对本届奋斗目标,特别是1987年实现“征集史料160篇30万字,图片资料30帧,出好两本书(即3、4辑),奋战创优先”的奋斗目标研究了具体措施。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在市政协常委会上强调指出:“文史资料工作是社会性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在实现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大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各级组织要加强领导,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市政府拨文史专款4800元。叶玉明、任朝东同志亲自深入到新桥、教字垭、沅古坪、茅岗等区,帮助健全、充实史料征集小组,解决征集小组在开展征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各区、街道办事处的党委把文史资料工作列入区、街道办事处、市直政协工作联络员职责范围,纳入政协工作的议事日程,进行统一布置,统一检查,统一总结评比。新桥区由于区委加强领导,撰稿队伍由原来3名发展到7名;全区4个乡镇都有撰稿员,区委书记李发荣还亲自撰写历史人物的史料。这个区1至9月上送史稿17篇6万余字。

二、健全组织,队伍日益壮大。

在实际工作中,文史委员会越来越感到要使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文史工作,必须巩固组织,扩大队伍。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先后深入全市7个区、4个办事处,宣传贯彻全省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巩固原有的征集小组,发展、充实文史业余撰稿员队伍。区、街道办事处的史料征集小组很快地由原来3至5名发展到5至7名,一般由区委、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或副区长担任组长,由1至2名撰稿员担任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骨干撰稿员由原来25名发展到45名,撰稿队伍发展到65名,遍布全市7个区、4个办事处的34个乡镇中的29个乡镇,使征集工作层层落到了实处。茅岗区委副书记杨学军在一次检查工作中发现本区落塔坪乡撰稿员侯宗唐没有办公室,便及时与乡政府研究,腾出了一间公房作办公用房。

三、征集不断深入,来稿日益增加。

与其他工作一样,只要放手发动、组织、依靠社会力量,史料征集工作就必然会由浅入深,由城市到农村,由国内至海外的发展。1987年除撰稿员征集、抢救的史料外,文史委员会还十分注重发动著名历史人物的亲属、同学、同事、学生撰写和奉献史料。1至9月底止,征稿201篇51万多字,超过计划41篇20万字,相当于前3年征集史料的总和;还征集了250帧图片。同时,还征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这些史料集中地记叙了本市近百年来历史事件的发生和著名历史人物的活动。

(吴云城)

组稿四得

高原

结合编辑工作征集史料往往容易见效，这已被实践所证明。实际上，这里的征集工作就是组稿工作，是直接为编辑工作服务的。征集到的稿件质量如何，决定着出版物质量的高低。但往往有这种情况，就是征集到的稿件并不一定都能利用，有时发表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要求征集的史料既要有相当的数量，又要有一定的质量，否则，结合编辑工作征集史料的显著效果就难以体现出来。近年来，我在这方面有过一些尝试，积累了点滴经验。现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同行。

一、要有明确的选题意识，把组稿的触角伸入到征集工作的空白处，这样不但容易见效，往往还能征集到一些上乘之作。1984年文史办决定编一本湖南和平解放后各地各部门接管情况的史料专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题决策，是因为《湖南文史资料选辑》过去出版过三本（第12、13、14辑）湖南和平解放的史料专辑，在湖南和平解放35周年前后，再出与过去内容基本相同的专辑，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湖南和平解放后的接管情况作为湖南和平解放的尾声却从来没有反映过，在文史办的库存稿件中也没有这样的内容，因此出版一本“接管”专辑既有必要，又有难度，办公室将编辑组稿任务交给了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征集到20多万字的史料，不少篇目有很高的价值，如周里写的回顾湖南和平解放，唐天际、钟明彪写的整编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杨第甫写的接管湘潭，欧阳迁写的接管省财政厅，郭清文写的接管益阳地区，刘

寿祺写的接管湖南教育事业等回忆录，都是上乘之作，这些重头稿件无疑奠定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的质量基础。有了好的稿件，当责任编辑心里也就踏实了。1985年10月，该辑出版后受到好评，还被列为《当代中国》湖南卷编写组的重要参考书目。

二、要善于捕捉征集信息，对重要史料线索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1984年12月4日是湖南医学院建校70周年校庆，“湖医”有省政协委员十余名，我从一些委员处得知该院将开展征集院史活动，就主动与该院党委宣传部联系，并表示《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可以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三亲”史料。同时约请省政协副主席凌敏猷（当时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惠霖等亲自撰稿。为什么要抓住这一史料征集线索不放呢？因为湖南医学院是一所国内外知名的医科院校，过去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称，培养过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李振翩、张孝骞、汤飞凡等等，征集湖南医学院的史料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事业，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1985年底，湖南医学院党委宣传部送来了近30万字的史料和数十张历史照片。1986年《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即以“湘雅春秋”为栏目刊发了其中近10万字的稿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湖南医学院解放前35年的历史概貌。湖南医学院一次就订购了1000本，其中一部分寄往了海外。北京市政协文史办看到湖南出版了“湘雅春秋”，最近也编辑出版了“协和旧事”的专辑。

三、充分利用重要纪念日和纪念活动，

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进行专题史料征集。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编辑出版一本湖南抗战的史料专辑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中国文史出版社将要出版我会编写的《湖南四大会战》一书,办公室库存的有关稿件基本被选用,要另出专辑,就必须重新组稿。于是在去年年底,办公室就主动与湖南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系,请他们发动会员撰稿,首先提出撰写要求,然后表示可根据稿件情况编辑出版一本以黄埔校友撰写的抗战回忆录为主的史料专辑。黄埔同学会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发函给三千多会员,请他们在1987年3月底以前将稿件写寄来。

4月初,湖南黄埔同学会将所征集到的120多篇,约30万字的“三亲”史料送到了文史办,经过认真筛选、核对史实、编辑加工,于8月底出版了抗战专辑,即《湖南文史资料》第26辑。该辑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湖南黄埔同学会一次就购买了2500本,无形中又极大地推动了发行工作,所以说结合编辑工作进行专题史料征集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四、只有发现并联系一批史料整理者,帮助一些老年人士整理稿件,才能保证所征集到的史料的质量。在征集工作中,我们不

(上接8面)

们的欢迎。所以在发行中,熟悉书刊内容,摸清各类读者的爱好,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

四、建立网点,将文史书刊及时送到读者手中。做任何工作都要有群众基础,发行工作也不例外。为了把文史书刊及时送到读者手中,我们在城关和全县四个大区建立了九个发行点,遴选了27位文史爱好者为发行员。这些同志都有很高的积极性和很强的事业心,文史书刊一到,他们就先睹为快,然后四处奔走宣传。由于他们对书中内容讲解生动,说服力强,方法灵活多样,销售率一

难发现,许多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或因文化不高,或因工作太忙,或因其他缘故,对撰写回忆录并不十分热心,这就需要有整理者前去协助。编辑人员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能力去联系一些既热心文史工作,又有相当水平的整理者,来帮助我们共同完成组稿任务。近年来我联系了10余名这样的整理者,他们为办公室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通过他们整理的稿件,一般都内容充实,结构合理,文字通顺,编辑起来省事。象《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周呈、唐天际、欧阳迁、郭清文等人写的重头稿件就分别是由黎风(省党史委副主任)、钟德灿(省军区副师职干部)、王和政(省财政厅离休干部、财政志编辑)、陈乐群(益阳市党史办主任)等人整理的;第23辑中有李振翩、汤飞凡的史料和卢惠霖的《我的几段经历》就是请刘笑春(湖医党委宣传部科长、院刊主编)和欧阳瑜(长沙晚报副刊部老编辑)整理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人的辛勤努力和默默劳动,我们通过《湖南文史资料》向社会提供的史料才更有价值,才更受读者欢迎。

以上四点体会,未经深思熟虑,完全是随笔写下的,浅陋之处难免,仅供同行参考。

般都很高。大瑶点的杨宏典形象地说:精神食粮也和物质食粮一样,好吃的东西不能一个人瞒着吃,要大家都能吃到才有味。他常常背着书样到处跑,不厌其烦地进行宣传,所以他手中文史书刊没有推销不出去的。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对《湖南文史资料》21辑很感兴趣,边抽香烟边说,书的内容确实好,就是贵了点。杨宏典随着他的话说:“还不到一包长沙牌的香烟钱呢!你说抽一包长沙牌香烟益处大,还是看一本文史资料益处大?”这位同志一听有道理,马上就掏钱买了一本。不到一年的时间,老杨就发行了文史资料320多本。